

#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家庭滿意度

于若蓉\* 陳婉琪\*\*

---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員，通訊作者  
E-mail: yurr@gate.sinica.edu.tw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mail: wchen@gm.ntpu.edu.tw

收稿日期：2019.10.22；接受刊登：2020.04.02

## 摘要

本文探討「夫妻相對收入」對已婚女性家庭滿意度的影響。具體提問為：在臺灣的雙薪家庭中，已婚女性是否會因工作收入相對於配偶的收入提高，而影響到她對家庭生活的滿意度？本文採用「家庭動態調查」多年期的追蹤資料，以年齡介於25-59歲的已婚女性為對象，探討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隨著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提高，其家庭滿意度呈現先提升而後降低的倒U形影響效果，且家庭滿意度在已婚女性與配偶收入接近時達到最高。此外，前述倒U形影響僅存在於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樣本；在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樣本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未見顯著影響。對於不同出生世代的分析則發現，對197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來說，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並無顯著影響。以上倒U形關係僅出現在197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身上，顯示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已悄然改變。

**關鍵詞：**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性別角色態度、家庭滿意度、家庭動態調查

## 壹、前言

歷經快速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臺灣社會，兩性關係、婚育行為，以及家庭樣貌均展現了極大的變化。在教育擴張趨勢之下，兩性在教育機會上的平等化在僅僅兩、三個世代內達成（陳婉琪 2005；Tsai et al. 1994）。婚育行為所發生的改變——晚婚、遲育、生育率降低、離婚率提升，短時間觀察看似緩步，但時間拉長來看，不可不謂劇烈（Chen and Chen 2014; Raymo et al. 2015）。

隨著女性教育機會的增加，更重要的連動變遷可能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之逐年提升。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的統計，在2004-2017年間，臺灣25-44歲有偶（含已婚、同居）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自61.87%提高為72.85%，提升的幅度超過10個百分點。伴隨前述趨勢，雙薪家庭占有偶女性人口的比例亦隨時間攀升。以2016年25-34歲的有偶女性為例，夫妻兩人均從事有酬工作的比例達65.36%，相較2000年同年齡層雙薪人口比例（44.36%），高出21.00%左右（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3，2017）。有偶男性、女性就業人口在2004年的每月平均實質收入分別為48,792、34,548元，2017年則分別為46,615、35,296元，期間兩群就業人口的實質收入差異有隨時間縮減的趨勢。<sup>1</sup>

前述有偶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雙薪家庭比例提高、有偶男性與女性就業人口收入差異縮減的趨勢，與先進國家所展現的趨勢一致

---

1 計算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106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在計算男性、女性的實質收入時，為避免物價的影響，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加以平減。在CPI的平減上，是以2016年作為基期。有關有偶男性實質薪資降低、有偶女性實質薪資提高的趨勢，未呈現於文中的統計數據顯示，未婚男性、女性的實質薪資亦呈類似的趨勢。臺灣近20年的薪資水準處於停滯狀態，已是廣受學界重視的議題（林依伶、楊子霆 2018；林常青等 2017；黃登興 2015）。至於兩性實質薪資的變動，既有研究主要針對兩性薪資差異縮減的現象進行探討。如李明純（2019）的分析結果顯示，高等教育擴張、性別歧視減少、女性全職工作選擇行為的改變，是兩性薪資差異縮減的主要原因。儘管這可以解釋兩性薪資差距縮減的現象，對於男性實質薪資降低、女性實質薪資提高的趨勢，其背後的原因仍有待探究。

(Brennan et al. 2001; Furdyna et al. 2008; Heckert et al. 1998; Waismel-Manor et al. 2016)。參照這些社會的發展經驗，可以想像的是，在臺灣社會中，由已婚女性擔負家計，甚或成為家計主要負責人的機會可能隨著時間攀升。另一方面，Chen and Hsieh (2017) 對臺灣的研究指出，已婚女性退出勞動市場的比率逐年下降，表示已婚女性持續參與勞動市場的可能性隨時間提高。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如果已婚女性收入相對於其配偶的收入提高，對她的家庭滿意度會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是個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如果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提高導致其家庭滿意度下降，可能在家庭與職涯發展間面臨較多衝突。反之，若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提高與其家庭滿意度的提升有關，這對已婚女性的家庭與職涯經營會是雙贏的局面。

有關妻子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效果，可自Becker (2009) 出版的《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中，找到相關理論的根源。根據他提出的家戶生產理論 (household production theory)，如果男性、女性分別在勞動市場、家務工作上具有比較高的生產力，採用「男主外、女主內」分工模式的夫妻，對雙方是最有利的。一旦妻子投身勞動市場，脫離「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會使得家庭滿意度下降 (Becker 2009)。獨立假說 (independence hypothesis) 則自夫妻相對資源的觀點提出見解，認為當妻子的相對收入提升，會使得妻子的經濟自主性提高、對婚姻的依附程度降低，並危及原有的夫妻權力關係 (Becker 2009)。前述理論均隱含，妻子相對收入的提高對家庭滿意度具有負向影響。

以上著名的女性經濟獨立假說及其重要的理論來源Becker (2009) 的家庭經濟學，事實上孕生於性別分工極端保守的美國1950、1960年代。<sup>2</sup>然而自1970年代以後，各式平權導向的社會運動

---

2 當時主流家庭模式為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除此之外，任何與常見婚姻模式不同的婚育行為（晚婚、不婚、離婚、單親，甚至遲育）都被視為偏離正常的人生軌道。舉例來說，1957年美國曾進行一項調查，每5個人當中有4個人認為不婚、單身者

風起雲湧，女性機會、偏好價值觀乃至兩性關係、家庭婚育行為，以上種種全都經歷了極大的變化。在變遷中／變遷後的社會脈絡中，不免令人質疑，上述理論及假說仍存有多少適用性？提出修正或替代理論的學者自然為數不少。舉例來說，Oppenheimer（1988）提出婚姻理論的修正，指出新時代家庭對女性經濟能力的需求，使得婚姻的形塑發生了變化。隨後的實證研究亦支持她的說法。譬如，Sweeney（2002）發現，與前一個世代相比，婚姻形成的基礎並不僅依賴男性薪資所得，女性分擔經濟收入的能力也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換句話說，對女性經濟能力的「需要」，這對之前的世代來說是不存在的。Cherlin（2000）則明白點出夫妻關係從兩性分工到對等協商的轉型。另有些學者雖仍採用獨立假說的用詞，但主張應有所修正。其論證基礎為，當妻子工作收入提高，除了獨立假說預期的負面影響效果外，亦可能同時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Brennan et al. 2001）。

在現有文獻及臺灣社會背景的脈絡下，對於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其自身的家庭滿意度的影響，作者將提出研究假設，說明可能的影響效果。此外，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影響效果是否會因性別態度價值觀而異，或依世代不同而有所差異，亦將分別提出對應的研究假設。本文採用臺灣「家庭動態調查」（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的追蹤調查資料，以25-59歲的已婚女性為對象，分析其相對於配偶的收入對其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以檢視研究假設是否能夠得到證實。本研究選擇聚焦於女性為分析對象，主要基於三個理由：一是在社會變遷中，女性所經歷的角色變化較為劇烈（與前幾個世代相比，她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及就業機會）；二是在學術辯論中，「經濟獨立論」向來是以女性為探討對象（Ono 1998; Raymo and Iwasawa 2005）。最後一個理由，則是追隨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ld的關懷，她

---

是有病的、神經病的、不道德的。「多數人同意男主外、女主內」當然就更不令人意外了。遲至1961年，仍有多數女性受訪者想要22歲前結婚、生養四個孩子、一生育就離職（Coontz 2005）。

著名的「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概念,乃針對女性提出她們在角色變遷轉型期的艱困窘境(Hochschild and Machung 1989)。

值得說明的是,既有的相關研究在探討已婚女性相對於配偶的收入對個人主觀感受或生命發展的影響時,多局限在婚姻關係,以婚姻滿意度(marital satisfaction)或婚姻穩定性作為應變項(Brennan et al. 2001; Heckert et al. 1998)。儘管自這類研究可以瞭解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婚姻關係的影響,但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是否會影響其對家庭生活的整體感受,仍是少被觸及的課題。探討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其個人家庭滿意度的關聯,是本文特別可以貢獻的地方。此外,本文所運用的資料性質及研究方法,讓我們得以檢視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動態與其家庭滿意度動態間的關聯,充分發揮長期追蹤資料的優勢,這是既有研究較為缺乏的。因此本研究將有助於為理論推演及實證研究上的分歧、不一致,提供適度的整合及化解。在第二章中,將對相關理論、量化研究文獻進行討論,並說明本文的分析假說。第三章中,將說明本文使用的資料、對變項的衡量方式,以及對分析模型的設定。第四章將說明分析結果。第五章除對分析結果進行總結外,也將說明本文在理論、量化研究及政策層面的意涵,並說明研究上的限制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近十餘年間,伴隨著女性經濟地位提升、雙薪家庭愈來愈普遍的發展趨勢,國外有不少社會、心理、經濟學者關注夫妻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運用實際的調查資料進行量化研究。

有關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效果,在此先自理論進行討論。Becker(2009)提出的家戶生產理論,強調家戶成員專業分工的重要性,認為若男性、女性分別具有勞動市場、家務生產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由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操持家務的專業分工方式,可讓家庭的生產效率最高。藉由男性在勞動市場得

到的勞動生產報酬、女性在家生產的家務價值的相互交換，可讓家庭滿意度達到最大。前述理論隱含，在一個以「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方式為主的社會中，由丈夫參與勞動市場、妻子操持家務是最有利的分工模式；若偏離這樣的性別分工模式，會造成家庭滿意度的降低（Booth et al. 1984; Brennan et al. 2001; Hiedemann et al. 1998; Rogers 2004; Sayer and Bianchi 2000; Treas 1993）。

同樣由社會學者提出的獨立假說，則自夫妻相對資源的觀點提供論述。依照獨立假說，相較妻子相對收入較低的家庭，在妻子相對收入較高的家庭中，妻子對婚姻的依附程度較低，對婚姻穩定性會有不利的影響效果（Johnson and Skinner 1986; Ruggles 1997）。此外，若妻子相對收入提高，可能危及原有的夫妻權力關係，讓丈夫覺得經濟支柱的地位受到挑戰，影響夫妻感情或婚姻穩定性（Heckert et al. 1998; Rogers 2004）。前述的家戶生產理論、獨立假說均隱含妻子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具有負向影響——我們暫且將之通稱為「女性經濟獨立假說」。

「女性經濟獨立假說」在家庭研究領域中雖曾火紅過一陣子，但後續遭受不少挑戰。Oppenheimer（1988, 1997）首先質疑女性經濟獨立假說在時代變遷脈絡下的適用性，並指出在男性薪資報酬長期下降的趨勢之下，他們的偏好逐漸轉變為「希望選擇一個可以分擔家庭經濟支柱的妻子」。Cherlin（2000）更指出Becker（2009）對婚姻的傳統分工觀點已過時而不適用，尤其是「丈夫與妻子利益是一致的」的這項假設。在男性與女性都可工作、各種分工更為彈性的今天，夫妻關係之對稱平衡及協商模式要比傳統分工觀點更能夠解釋婚姻的形成及瓦解。在類似的邏輯下，Brennan et al.（2001）主張經濟獨立假說應做適度修正，因為除了獨立假說所預測的負向影響效果外，妻子相對收入亦可能透過其他管道對家庭滿意度帶來正向影響。首先，若夫妻在家庭經濟上的貢獻相當，雙方會因彼此的角色較為平等，而有較佳的家庭滿意度（Scanzoni 1972, 1978）。其次，當妻子的相對收入



增加，可藉由購買市場勞務（如聘請家庭管家），取代原本主要由妻子生產的家務（如洗衣、煮飯、子女照料），有助於減少夫妻間的磨擦，並提升家庭滿意度（Dakin and Wampler 2008; Hardie et al. 2014）。

在實證研究方面，眾多文獻所累積的實證結果，可說相當繁雜混亂，極難歸納出一致的結論。對於國外文獻，以下先討論妻子收入水準或相對收入（通常以妻子收入占夫妻總所得的比例測量）對婚姻穩定度的影響。一方面，不少實證研究得到支持經濟獨立假說的分析結果：在控制丈夫收入及其他相關變項之後，妻子的收入水準或相對收入愈高，離婚機會愈大（Jalovaara 2003; Kalmijn et al. 2007; Rogers 2004; Spitze and South 1985）。不過，另一方面，為數不少的實證文獻指出妻子收入或相對收入的多寡與離婚機會並無顯著關聯（Greenstein 1990, 1995; Hoffman and Duncan 1995; South and Lloyd 1995）。也有研究顯示，妻子所得對離婚機會呈現U形的影響效果（Ono 1998）。

前述研究大多聚焦於婚姻穩定度，提問大多是已婚女性於婚姻裡的相對收入是否造成離婚機率的提升。另一個高度相關的重要觀察指標則是婚姻品質。關於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其婚姻品質之間的關係，相關量化研究多以美國的調查資料作為素材，研究結論亦相當混亂而不一致。<sup>3</sup>其中，Brennan et al.（2001）、Gong（2007）、Lee and Ono（2008）、Rogers（1999）的實證研究均發現，已婚女性的相對收入對其婚姻品質並無顯著影響效果。Rogers and DeBoer（2001）對追蹤調查資料的研究，則得到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其婚姻品質具正向影響的結果。Furdyna et al.（2008）將研究對象區分為已婚的白人女性與黑人女性，實證結果發現白人女性的相對收入對其婚姻品質具負向影響，黑人女性則無顯著影響。

3 所使用的婚姻品質測量，包括婚姻幸福感（marital happiness）、婚姻滿意度、婚姻調適（marital adjustment）、夫妻關係等（Johnson et al. 1986）。



在美國社會之外，以其他國家為背景的量化研究則不算太多。在這些研究中，Hardie et al. (2014) 採用德國的追蹤調查資料，發現妻子相對收入對其婚姻品質並無顯著影響。Lee and Ono (2008) 對日本資料的研究發現，若丈夫未能扮演好主要經濟支柱的角色，妻子的婚姻品質較差。Zhang and Tsang (2012, 2013)、Zhang et al. (2012) 對中國若干城市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妻子相對收入對其婚姻品質有負向影響，與Lee and Ono對日本的研究結果相近。

從相關量化研究的討論可知，既有研究的分析結果相當分歧。研究對象身處的文化、社會背景固然重要，分析對象的性別、資料性質、模型設定等因素，都可能左右分析結果 (Brennan et al. 2001; Hardie et al. 2014; Rogers and DeBoer 2001)。有人認為不同社會之間的性別文化差異，會影響分析結果。舉例來說，Lee and Ono (2008) 的研究就發現，夫妻相對收入對婚姻幸福感的影響模式在美國及在日本有所不同。美國女性之婚姻幸福感與其自身所得較相關，而日本女性似乎更為偏好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安排。有人認為，使用不同性質的資料，會影響結論之適切性。舉例來說，Hardie et al. (2014)、Rogers and DeBoer (2001) 等指出，在分析妻子相對收入的影響效果時，如果採用的是橫斷面調查 (cross-sectional survey) 資料，會較難釐清妻子相對收入與應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相對於橫斷面調查資料，追蹤調查資料是較為理想的研究素材。此外，也有學者指出，多數既有研究在分析模型設定方面，僅考慮妻子相對收入的一次項影響效果，但此假設可能並不適當。<sup>4</sup>具體來說，Bertrand et al. (2015)、Heckert et al. (1998) 指出，如果妻子相對收入與婚姻品質間具有非線性關係，但在分析時只考量一次項影響，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有可能為正或負，或不顯著的影響效果。

在臺灣社會脈絡中，夫妻相對收入是否影響主觀家庭滿意度？

---

4 少數的例外，包括Bertrand et al. (2015)、Heckert et al. (1998)。

若此經濟因素的確不可忽視，那麼，它又是什麼樣的影響模式？相較於為數眾多的國外文獻，臺灣雖已累積不少優質的家庭主題資料庫，既有研究亦提供了部分線索，但仍未能完整回答這個問題。先從較直接的測量——「婚姻品質」來看，臺灣既有研究探討婚姻品質的有不少，但探討因素大致包括互動模式、家庭結構、社會支持、婚前同居，或夫妻相互之跨時影響，鮮少針對夫妻相對收入此經濟因素來探討（吳明燁、伊慶春 2003；蕭英玲、黃芳銘 2010；謝雨生、周玉慧 2012；鍾宜吟、蔡明璋 2008）。唯一一份較相關的研究（Xu and Lai 2004），利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若夫妻間的婚姻權力較平等，則婚姻品質較好，婚姻爭吵較少。

在婚姻穩定性方面，陳婉琪、吳慧靖（2011）採用PSFD資料，觀察臺灣已婚女性就業量對離婚機率的影響。她們發現婚後長期未就業或持續就業的女性，離婚的可能性顯著高於其他女性，顯示就業量與離婚機率間呈U形關係。兩位作者揣測，相較於就業量適中的女性，就業量偏低的家庭型已婚女性可能因缺乏經濟能力、婚姻內協商能力不足而導致婚姻不穩定，而就業量偏高的就業型已婚女性則較可能因負擔過重、蠟燭兩頭燒而展現出稍微偏高的離婚率。顯示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此經濟因素對離婚機率的影響，確實可能存在複雜的非線性關係。

在以上線索的指引下，我們猜測收入遠低於或遠高於配偶的已婚女性，其家庭滿意度都會比夫妻收入相近、權力對稱者來得低，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其主觀家庭滿意度，具有倒U形的影響效果。*

在更精準地討論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預期影響效果前，針對臺灣社會性別角色態度之分布及變遷，需先做些背景說明。2016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顯示，對於「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庭」的說法，儘管有超過一半（55.9%）的受訪者不同

意，仍有近四成（38.6%）的受訪者表示同意。顯示臺灣民眾的性別角色態度雖已隨社會變遷而逐漸轉變，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抱持保守的性別角色態度（呂玉瑕 2011）。

有鑑於相關文獻均強調性別角色態度的重要性（Coontz 1997; Hood 1983; Oppenheimer 1997; Ruggles 1997），我們認為，若要假設上述相對收入效應對所有人的影響均相同，並不合理。對兩性分工議題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特定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很可能大不相同。臺灣社會有時仍延續著父權社會的傳統習俗與思維，但也同時在性別平等化上經歷快速的變遷。這代表社會上人們各自抱持著彼此迥異的性別角色態度，同時並存於我們身邊的日常。Greenstein（1995）指出，性別角色態度較不傳統、較傾向平等的女性，在需要分擔家計的情況下，會因為對家務分工的不平等較難以忍受，而較容易產生負面的情緒感受。尤其是在家計分擔、家務分攤不相稱的情況下，其不公平的感受會更為強烈。相對而言，性別角色態度較傳統的女性，會因為較甘於操持家務，使得內在情緒感受不致因外在的勞動參與而有太多起伏（Greenstein 1995）。因此，本文預期，上述妻子相對收入與其家庭滿意度之間的倒U形曲線關係，僅對性別角色態度較不傳統的女性發生作用。亦即，較不認同「男主外、女主內」分工方式的女性，由於較傾向性別平等的對等關係，所感受到的家庭滿意度可能隨著其相對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但當夫妻相對收入超過某個水準時，會因為擔負的家計與分擔的家務不相稱，而帶來家庭滿意度的下降。較保守傳統的女性，可能因安於照料家人、操持家務的角色，且較甘於配偶的權力支配，而使其所感受的家庭滿意度不致因相對收入的高低而有太多變化。據此，提出假設如後。

*H2：以上相對收入效應是否發揮影響，會因性別態度價值觀而異。相較於認同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已婚女性，在不認同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已婚女性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倒U形影響效果較強烈。*

性別角色態度在本文研究問題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性別價值觀

之傳統與否，又與世代高度相關。呂玉瑕（2011）的研究顯示，以世代變遷而言，不同世代所對應歷史脈絡下社會性別價值及規範的差異對於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變遷有較大解釋力。換言之，女性之性別角色態度變遷有較大成分歸因於世代交替。基於此，本文假設夫妻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之影響，會因出生世代而異。

*H3：以上相對收入效應是否發揮影響，因出生世代而異。相較於年長世代的已婚女性，在較晚出生的已婚女性世代當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倒U形影響效果較強烈。*

本文將藉由臺灣PSFD的追蹤資料，檢視這三項假設能否由分析結果得到印證。不同於多數量化研究的是，在應變項的測量上，相關研究多以婚姻品質作為測量。由於PSFD對已婚受訪者的婚姻滿意度、夫妻關係並沒有納入每一波的調查問卷中，本文是以家庭滿意度作為測量。家庭滿意度是請受訪者對家庭生活的整體滿意程度進行評估，而非局限於婚姻面向，與相關文獻習用的婚姻品質測量不同。然因家庭滿意度、婚姻滿意度兩個測量間具有高度相關（Olson et al. 1989），作者認為：以家庭滿意度作為應變項，仍可與國外相關研究相互參照。另外，在分析模型中，除主要的研究變項（已婚女性相對於配偶的收入、性別角色態度、出生世代）之外，將在控制變項中納入「與父母同住與否」、「與配偶父母同住與否」、「子女年齡結構」等變項，以控制相關家庭因素的影響。在下一章中，除資料來源外，將說明量化模型設定及變項測量方式。

## 參、研究方法

### 一、資料來源

臺灣PSFD乃是以家庭為研究主題的一項長期追蹤調查計畫，自1999年啟動，目前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

中心負責規劃、執行，經費主要來自中央研究院。這項以全臺灣為範圍的追蹤調查計畫，以1953-1964、1935-1954、1964-1976、1977-1983、1984-1991年出生的人口為對象，這五群主樣本分別於1999、2000、2003、2009、2016年進行首波面訪抽樣調查（亦即，該批樣本的第一次調查）。每一群主樣本的首波調查是以符合出生年次的戶籍人口資料作為抽樣清冊（sampling frame），採用分層多階段且按數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抽出個人。對於完成首波問卷的受訪者，隨後會持續進行追蹤訪問。在2012年之前，是採逐年調查的方式進行追訪；直到2012年起，才改為每兩年追訪一次（于若蓉、黃奕嘉 2018）。

本文所使用的家庭滿意度題項，從2007年的調查開始，才持續放在每一波的追蹤問卷之中。因此，文中使用的資料為2007-2016年間所蒐集的主樣本追蹤調查資料。所納入的主樣本群，包括於1999、2000、2003、2009年進行首波調查的四群主樣本。以1999年啟動首波調查的主樣本群為例，其在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4、2016年追蹤調查蒐集到的問卷資料，都納入本文的分析資料中。以這群主樣本而言，如果2007-2016年間的每次調查都能完成訪問，每位受訪者可以蒐集到8波的問卷資料，而有8個時點的觀察值。然而，由於受訪者可能因死亡、健康不佳、拒訪或接觸不到等因素而導致某個（些）波次無法完成訪問，實際的觀察值數目可能少於8個。對2000、2003、2009年啟動首波調查的主樣本群，可依此類推。

基於本文的研究目的，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女性樣本。在前述四群主樣本於2007-2016年完成訪問的問卷資料中，女性有3,118人。基於研究的需要，我們保留在受訪時處於已婚狀態，且年齡介於25-59歲間的觀察值（在這樣的樣本條件限制之下，對應的受訪者人數為1,302位）。將年齡限制為25-59歲，主要是因為此一年齡層的人口為勞動市場主力，較不可能因為在學、退休等因素脫離勞動市場。最後，則是缺失值的處理：如果受訪者或其配偶在受訪時未從事工作或

工作收入為零（如從事無酬家屬工作），我們仍保留這類觀察值；如果受訪者或其配偶在受訪時點的收入為缺失值（如回答不知道或拒答），則會刪除觀察值。<sup>5</sup>在進一步刪除變項（如工作收入、性別角色態度）缺失的觀察值後，實際使用的分析資料有5,392筆，對應的受訪者人數為1,216位。因資料缺失所帶來的可用觀察值減少，大約是6.6%。

## 二、估計模型與變項衡量

對於家庭滿意度，儘管有學者偏好以多個題目組成的量表進行測量，亦有研究者指出，建立在單一題目的測量，表現不遜於自多個題目建立的測量（Johnson 1995; Johnson et al. 1986）。本文採用的家庭滿意度測量，來自問卷中的單一題項：「您對目前的家庭生活滿意嗎？」該題的四個選項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還算滿意、很滿意。由於答案反映了受訪者的主觀排序，該變項可視為序次性的不連續變項（ordered discrete variable）。

對女性受訪者 $i$ 於 $t$ 年的家庭滿意度 $Q_{it}$ ，假設該變項與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等變項間的關係可表示如式（1）。

$$Q_{it} = \beta_0 + \beta_Y \cdot Y_{it} + \sum_k \beta_k \cdot X_{k,it} + \sum_l \beta_l \cdot X_{l,i} + \mu_i + \omega_{it} \dots \dots \dots (1)$$

其中， $Y_{it}$ 代表已婚女性的相對收入， $X_{i,t}$ 包含受訪者的性別角色態度、出生世代及不隨時間變動（time-invariant）的控制變項， $X_{k,it}$ 則為隨時間變動的（time-varying）控制變項， $\mu_i$ 為附屬於個別受訪者的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s）， $\omega_{it}$ 則為伴隨受訪者、觀察時點變動的誤差項（error term）。採隨機效果模型的主要原因是，個人無法觀測的誤差項，可吸納於個人隨機效果中。由於家庭滿意度為序次變項，將以

5 作者曾嘗試以受訪者與其配偶均從事有酬工作的觀察值作為分析資料，由於主要的分析結果與原有的分析結果相近，未將相關結果列於文中。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隨機效果序次probit模型 (random-effects ordered probit model) 進行分析。<sup>6</sup>

對於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此一解釋變項，本文依循Hardie et al. (2014)、Rogers (1999)、Rogers and DeBoer (2001) 的作法，以已婚女性的收入份額作為測量。在測量的操作上，是以已婚女性每月工作收入除以夫妻每月工作收入的總和衡量。此一測量的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愈高，表示已婚女性的相對收入愈高。除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一次項外，考量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效果，也納入已婚女性收入份額平方項作為解釋變項。納入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相對收入平方項 ( $Y_{it}^2$ ) 的模型，可表示如下列的式 (2)。

$$Q_{it} = \beta_0 + \beta_{y1} \cdot Y_{it} + \beta_{y2} \cdot Y_{it}^2 + \sum_k \beta_k \cdot X_{k,it} + \sum_l \beta_l \cdot X_{l,i} + \mu_i + \omega_{it} \quad (2)$$

如果假設HI成立，分析得到的 $\beta_{y1}$ 、 $\beta_{y2}$ 參數估計值應分別呈現正向、負向效果。對於模型的控制變項，參照既有研究，納入可能影響婚姻或家庭滿意度的變項，包括受訪者的年齡、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以及配偶健康狀況、家庭收入、子女年齡結構等。關於年齡，多數研究發現，隨著個人生命歷程的變化，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會先隨年齡降低，到中年階段到達谷底後再隨年齡提升，而呈現U形的關係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8; Ulloa et al. 2013)。另外，也有研究發現生活滿意度與年齡無顯著關聯 (Costa et al. 1987) 或呈負向關聯 (Deaton 2008)。

關於教育程度，多數研究發現，教育程度愈高者，婚姻品質愈佳 (White and Rogers 2000)。未納入配偶教育程度的原因是：夫妻的教育程度有正向配對的關係 (Smits and Park 2009)，為避免同時納

6 對隨機效果序次probit模型，本文是以Stata的xtoprobit指令進行估計。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該指令的相關說明。



入受訪者、受訪者配偶教育程度可能的高度相關問題，模型僅放入受訪者本身的教育程度變項。對於健康狀況，研究多發現健康狀況較佳者，家庭、婚姻生活品質均較佳（Robles et al. 2014）。由於配偶的健康情況也可能左右家庭滿意度，除受訪者的健康狀況外，模型也納入配偶的健康狀況。至於家庭收入，部分研究發現家庭收入對婚姻品質並無顯著影響（Jackson et al. 2017）；亦有研究發現，在貧窮的家庭中，婚姻品質相對較低（Hardie et al. 2014）。

在家庭結構方面，一般研究發現，若育有初生或年幼子女，對婚姻品質有不利的影響；但另一方面，為人父母的滿足感亦可能讓婚姻品質提升（Bradbury et al. 2000; Glenn 1990; Spanier and Lewis 1980）。因應不同年齡的子女可能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模型納入子女年齡結構虛擬變項。除前述變項外，與受訪者父母同住與否、與配偶父母同住與否等家庭結構變項，亦納入控制變項。

對於出生世代、性別角色態度這兩項主要的研究變項，出生世代是依受訪者的出生年次設定虛擬變項，將1970年之後出生者視為「年輕世代」，設變項值為1；1970年及其之前出生者則視作「年長世代」，設變項值為0。至於性別角色態度，相關研究指出，性別態度較傳統的女性，因較能安於傳統婚姻的夫妻分工方式，而有較高的婚姻滿意度（Lye and Biblarz 1993）。在此以兩個問卷題項建立測量。這兩個題項，是分別就「丈夫的責任是賺錢養家，太太是照料家庭」、「做妻子的幫助丈夫的事業比追求自己的事業還重要」兩個陳述，請受訪者在1-5中選一個最符合自己想法的分數，1代表「不重要」、5代表「絕對重要」。性別角色態度變項是以答項的平均值作為測量，數值愈高表示性別角色態度愈傳統。作者亦曾嘗試其他題項，由於前述兩個題項的相關係數（0.3左右）高於其他各種題項組合，乃用於測量性別角色態度。<sup>7</sup>在分析模型中，用於測度性別角色

7 一般研究對於題組相關係數的要求至少要高於0.5，這兩個題項的相關係數只有0.3，

態度的兩個題項分別取自第一波、2011年間卷資料，教育程度亦取第一波問卷資料，均為不隨時間改變的變項。其他變項的測量則來自各波調查資料，是可能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對於納入分析模型的變項，各變項的操作定義可詳表1，基本統計特性則可參考表2。

除了以式（1）與式（2）分析所有樣本資料外，在分析中也依照受訪者的性別角色態度、出生年分將樣本分群，分別進行分析，以檢視假設H2與假設H3是否成立。對於假設H2，在性別角色態度的樣本分群上，是將性別角色態度變項介於3.5-5.0分的受訪者歸類為「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樣本，介於1.0-2.5分的受訪者作為「非傳統」態度樣本，分別針對兩群樣本進行式（2）的估計。<sup>8</sup>至於中間態度（性別角色態度變項大於2.5且小於3.5）的樣本，由於假設H2是以傳統、非傳統樣本為觀察對象，並未納入這部分的分析資料中。有關假設H3，在出生世代的區分上，是依照已婚女性的出生年次，區分為年長世代（1970年及其之前出生者）及年輕世代（1970年之後出生者）兩個群體。<sup>9</sup>分析結果將於後文說明。

## 肆、分析結果

### 一、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

式（1）與式（2）的分析結果分別列於表3。自表中可知，若僅

相關性相當低。但考量所使用的是二手資料，只能遷就既有題項測量。除文中採用的兩個題項外，曾嘗試後列六個5點量尺題項（RR2011問卷D1題組）：(1) 女人很能幹會讓人不舒服；(2) 如果夫妻都有工作，應該要平均分擔家事；(3) 男人不出外工作，料理家務也很適合；(4) 做妻子的幫助丈夫的事業比追求自己的事業還要重要；(5) 在經濟不景氣時，女性員工應比男性員工先被解僱；(6) 男人優柔寡斷（很難下得了決定）會讓人不舒服。然而，分析結果顯示，這六個題項無論如何組合，所得到的Cronbach's  $\alpha$ 值都不高，兩兩相關係數也不高。

8 對於具有「傳統」、「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兩群樣本，各變項的平均值列於附錄一。

9 依出生年次區分的「年長世代」、「年輕世代」兩群樣本，各變項的平均值列於附錄二。

表1 變項定義說明

變項名稱	操作定義
家庭滿意度	原題項「您對目前的家庭生活滿意嗎」的答案為1-4量尺，經反向編碼後作為測量，分數愈高表示家庭生活愈滿意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	個人每月工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平方項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平方項
性別角色態度	採用的兩個題項為：「丈夫的責任是賺錢養家，太太是照料家庭」、「做妻子的幫助丈夫的事業比追求自己的事業還要重要」。兩者的答案均為1-5量尺，在此取其平均值作為測量，分數愈高表示性別角色態度愈傳統
出生世代	依出生年分，將1970年之後出生者作為「年輕世代」，編碼為1；否則（1970年或之前出生）視為「年長世代」，編碼為0
年齡	自出生年分、受訪年分轉換而來
教育程度	將最高教育程度區分成四個虛擬變項：國中或以下、高中或高職、專科、大學或以上
自己健康狀況	依個人健康狀況的主觀評量，將「很好」、「好」或「普通」編碼為1，「不好」或「很不好」編碼為0
配偶健康狀況	依個人對配偶健康狀況的主觀評量，將「很好」、「好」或「普通」編碼為1，「不好」或「很不好」編碼為0
子女年齡結構	
5歲或以下子女	若有5歲或5歲以下的子女，編碼為1，否則為0
6-18歲子女	若有6-18歲的子女，編碼為1，否則為0
19歲或以上子女	若有19歲或19歲以上的子女，編碼為1，否則為0
與自己父母同住	若跟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同住，編碼為1，否則為0
與配偶父母同住	若跟配偶的父親或母親同住，編碼為1，否則為0
家庭收入	以個人與配偶每月工作收入的加總計算，轉換為以千元為單位後，再以CPI平減（以2016年為平減的基期）

註：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考慮已婚女性相對收入一次項的影響效果，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並無顯著影響。但在納入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平方項後，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及其平方項對家庭滿意度均呈顯著影響（5%水準下顯

表2 變項的基本描述統計

變項	平均值／百分比	標準差
不隨時間變動的變項		
性別角色態度	3.37	0.95
出生世代(%)		
年長世代	47.78	
年輕世代	52.22	
教育程度(%)		
國中或以下	27.22	
高中或高職	30.26	
專科	15.63	
大學或以上	26.89	
隨時間變動的變項		
妻子相對收入	0.37	0.29
年齡	43.05	9.66
家庭滿意度	3.16	0.58
自己健康狀況(%)	91.77	
配偶健康狀況(%)	92.28	
子女年齡結構(%)		
5歲或以下子女	24.87	
6-18歲子女	40.67	
19歲或以上子女	42.80	
與自己父母同住(%)	8.92	
與配偶父母同住(%)	28.45	
家庭收入	69.42	59.68
受訪者人數	1,216	
觀察值筆數	5,392	

註：對不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基本統計值是以「受訪者」為單位計算；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則以「觀察值」為單位計算。

著)，而前者的係數估計值為正，後者則為負值。顯示當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提高，其家庭滿意度會先隨已婚女向相對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而後再隨之降低，呈現倒U形的影響效果。分析結果支持假設H1的預測。

表3 家庭滿意度的隨機效果序次probit模型

變項	不含平方項的模型	包含平方項的模型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	-0.0622 (0.0923)	0.4424 (0.2218)*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平方項	-	-0.5709 (0.2282)*
性別角色態度	0.0918 (0.0412)*	0.0950 (0.0412)*
出生世代	-0.1610 (0.1344)	-0.1694 (0.1344)
年齡	-0.0797 (0.0387)*	-0.0798 (0.0387)*
年齡平方項	0.0008 (0.0004)*	0.0009 (0.0004)*
教育程度（對照組：國中或以下）		
高中或高職	0.2640 (0.1016)**	0.2639 (0.1016)**
專科	0.4296 (0.1268)***	0.4148 (0.1269)**
大學或以上	0.6790 (0.1272)***	0.6620 (0.1273)***
自己健康狀況	0.3675 (0.0806)***	0.3709 (0.0806)***
配偶健康狀況	0.4431 (0.0878)***	0.4364 (0.0878)***
5歲或以下子女	-0.2035 (0.0676)**	-0.1950 (0.0677)**
6-18歲子女	-0.0753 (0.0631)	-0.0787 (0.0631)
19歲或以上子女	0.1853 (0.1015)#	0.1783 (0.1016)#
與自己父母同住	0.0113 (0.0766)	0.0108 (0.0766)
與配偶父母同住	0.0402 (0.0559)	0.0358 (0.0560)
家庭收入	0.0026 (0.0005)***	0.0025 (0.0005)***
受訪者人數	1,216	1,216
觀察值筆數	5,392	5,392
Log-likelihood	-3,917.72	-3,914.59

註：1. 常數項估計值未列於表中。

2.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自式（2）微分可知，當家庭滿意度（ $\hat{Q}_i$ ）處於極大值時，以下的關係式成立。

$$\partial \hat{Q}_i / \partial Y_i = \hat{\beta}_{y1} + 2\hat{\beta}_{y2} \cdot Y_i^* = 0 \dots \dots \dots (3)$$

因此，當家庭滿意度達到最高時，對應的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值（ $Y_i^*$ ）如後。

$$Y_{it}^* = -\hat{\beta}_{Y1}/(2\hat{\beta}_{Y2}) \dots\dots\dots (4)$$

對於表3的分析結果，將實際估計值代入式（4）可知，當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為0.4時，家庭滿意度會達到極大值。

前述結果顯示，隨著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增加，已婚女性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經濟自主性隨之提高，有助於提升家庭滿意度。但當已婚女性收入提高到與配偶收入接近的水準時，可能因為配偶作為主要經濟支柱的角色受到撼動，或因已婚女性覺得在經濟上不需再依附配偶，而影響到夫妻間的關係。此外，在已婚女性負擔起較多家計，而又需要兼顧家庭的情況下，可能會使得已婚女性的家庭滿意度下降。

在已婚女性相對收入之外，對出生世代、性別角色態度這兩項主要的研究變項，表3顯示，無論將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平方項納入模型與否，這兩項變項的影響效果變化不大：出生世代未呈顯著影響；性別角色態度變項的影響效果顯示，性別角色態度愈傳統的已婚女性，家庭滿意度愈高，與Lye and Biblarz（1993）的發現相似。對於控制變項，表3顯示，不論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平方項納入模型與否，控制變項的影響效果變化不大。首先，已婚女性的年齡對其家庭滿意度具U形的影響效果，顯示家庭滿意度會先隨已婚女性的年齡下降而後提升，與一般研究的發現相近（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8）。在教育程度方面，學歷較高的受訪者家庭滿意度較高，與過去相關研究的發現一致（Stanley et al. 2006）。至於健康狀況，若受訪者本身的健康狀況良好或配偶的健康狀況良好，都會帶來較高的家庭滿意度。

在家庭結構因素方面，表3顯示，家中若有5歲或以下的子女，對家庭滿意度有負面影響；而19歲或以上的子女，則有微弱的正向影響（10%水準下顯著）。顯示若有年幼子女，已婚女性可能因為子女照料較耗費心力、時間，且能自主的時間減少，而影響其家庭滿意度。滿19歲的子女可能因為較無課業壓力，並能分擔家務、分享心事，而對母親的家庭滿意度有正面助益。

家庭收入對已婚女性的家庭滿意度具顯著的正向影響（1%水準下顯著），與Jackson et al.（2017）的結果不同。對於家庭收入的正向影響，可能的解釋是，收入愈高的家庭，愈可能僱人協助家務、以市場勞務（如外食、衣服送洗）取代家庭生產，或以市場產品（如掃地機器人、自動洗衣機）取代人力投入，因而減少投注於家務的時間、心力，有助於家庭滿意度的提升。

## 二、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依性別角色態度分群的分析

前一小節的分析結果顯示，對已婚女性受訪者，隨著其相對收入的增加，家庭滿意度會先隨之增加；在已婚女性收入與配偶收入接近時，家庭滿意度會隨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在這小節中，為觀察假設 $H2$ 成立與否，將已婚女性樣本依性別角色態度變項分群，分別觀察妻子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性別角色態度變項如前所述，為1.0-5.0間的數值，數值愈大表示性別角色愈傳統。在此將性別角色態度變項介於3.5-5.0的受訪者歸類為「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樣本，介於1.0-2.5的受訪者作為「非傳統」態度樣本，分別針對兩群樣本進行式（2）的估計。<sup>10</sup>

對抱持「傳統」、「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已婚女性，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分析結果分別列於表4。自該表可知，在「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樣本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一次項與平方項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對抱持「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則呈倒U形影響，而家庭滿意度在已婚女性與配偶收入相當時（50%）達到最高。前述結果，與假設 $H2$ 的預

10 對「中間」態度（性別角色態度變項大於2.5且小於3.5）樣本的分析發現，妻子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效果與「非傳統」樣本相近，均呈倒U形影響。如將「中間」、「非傳統」樣本合併，所得到的主要結果與「非傳統」樣本相近。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相關結果。



表4 家庭滿意度的隨機效果序次probit模型：  
女性樣本依性別角色態度分群

變項	傳統樣本	非傳統樣本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	0.2824 (0.2815)	1.0298 (0.5022)*
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平方項	-0.4550 (0.2847)	-1.0231 (0.5229)#
出生世代	-0.1888 (0.1823)	-0.2279 (0.2822)
年齡	-0.0777 (0.0518)	0.0404 (0.0829)
年齡平方項	0.0009 (0.0006)	-0.0006 (0.0010)
教育程度（對照組：國中或以下）		
高中或高職	0.3002 (0.1209)*	-0.0494 (0.2891)
專科	0.4457 (0.1643)**	-0.0292 (0.3009)
大學或以上	0.6725 (0.1760)***	0.4864 (0.2778)#
自己健康狀況	0.3574 (0.0991)***	0.4122 (0.1737)*
配偶健康狀況	0.4210 (0.1054)***	0.1073 (0.2073)
5歲或以下子女	-0.1487 (0.1002)	-0.2790 (0.1191)*
6-18歲子女	-0.1178 (0.0853)	-0.0667 (0.1279)
19歲或以上子女	0.1423 (0.1346)	0.3197 (0.2105)
與自己父母同住	-0.0471 (0.1068)	-0.0683 (0.1489)
與配偶父母同住	0.0855 (0.0762)	0.1299 (0.1107)
家庭收入	0.0039 (0.0007)***	0.0017 (0.0008)*
受訪者人數	687	326
觀察值筆數	3,140	1,442
Log-likelihood	-2,285.37	-1,027.15

註：1. 常數項估計值未列於表中。

2.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期相符。<sup>11</sup>顯示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主要顯現在「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已婚女性中。

11 除原本的設定外，作者曾嘗試採用「丈夫的責任是賺錢養家，太太是照料家庭」單一題項（5點量尺）作為性別角色態度測量。將選1、2者歸為「非傳統」樣本，選4、5者則歸為「傳統」樣本，所得到的主要分析結果與表4相似。考量論文篇幅，相關結果並未列於文中，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對於「非傳統」樣本的倒U形影響效果，如假設H2的預期，對不重視「男主外、女主內」規範的已婚女性，隨著相對收入的增加，會因為自己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提升、經濟自主性提高，而有較高的家庭滿意度。但在已婚女性的收入提高到超越配偶的收入之後，會因家計主要由自己負擔，在需要兼顧家庭的情況下，致使家庭滿意度隨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至於「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樣本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未呈現顯著影響的結果，在此也嘗試提供解釋。對性別角色態度較傳統的已婚女性，隨著相對收入的增加，固然可能因為對家庭經濟的相對貢獻增加而使得家庭滿意度提高，但同時可能因為背離了配偶養家的分工模式而造成家庭滿意度下降。在前述力量的作用下，使得這類已婚女性的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未呈顯著影響。

### 三、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依世代分群的分析

此一小節中，將已婚女性樣本依出生年次區分為不同的群體，觀察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其平方項在不同群體的影響效果，以檢視假設H3能否得到分析結果的支持。在出生世代的區分上，如同先前的設定，是依已婚女性的出生年次區分為年長世代（1970年或之前出生者）、年輕世代（1970年之後出生者）兩個群體。

對年長、年輕世代樣本，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分析結果分別列於表5。自該表可知，在年長世代樣本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及其平方項均未呈顯著影響，「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樣本的分析結果相近。至於年輕世代，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則呈倒U形影響，與「非傳統」樣本的分析結果類似。對年輕世代而言，家庭滿意度的最高點與「非傳統」樣本接近，在已婚女性收入接近配偶收入水準時（46%）達到最高。前述分析結果，印證了假設H3的預期。

表5 家庭滿意度的隨機效果序次probit模型：女性樣本依出生世代分群

變項	年長世代樣本	年輕世代樣本
妻子相對收入	0.1527 (0.2995)	0.8101 (0.3461)*
妻子相對收入平方項	-0.3347 (0.2893)	-0.8824 (0.4174)*
性別角色態度	0.0737 (0.0596)	0.1113 (0.0569)#
年齡	-0.0125 (0.1096)	-0.2171 (0.1487)
年齡平方項	0.0002 (0.0011)	0.0028 (0.0021)
教育程度（對照組：國中或以下）		
高中或高職	0.3073 (0.1225)*	0.0796 (0.2112)
專科	0.4446 (0.1869)*	0.2344 (0.2245)
大學或以上	0.5515 (0.2045)**	0.5276 (0.2220)*
自己健康狀況	0.2441 (0.1001)*	0.6241 (0.1390)***
配偶健康狀況	0.3743 (0.1081)***	0.6024 (0.1556)***
5歲或以下子女	-0.2525 (0.2697)	-0.1544 (0.0708)*
6-18歲子女	-0.1099 (0.1014)	-0.0478 (0.0854)
19歲或以上子女	0.0934 (0.1237)	0.3805 (0.2435)
與自己父母同住	-0.0649 (0.1365)	-0.0217 (0.0987)
與配偶父母同住	0.1516 (0.1006)	-0.0344 (0.0713)
家庭收入	0.0038 (0.0008)***	0.0017 (0.0006)**
受訪者人數	581	635
觀察值筆數	2,878	2,514
Log-likelihood	-1,990.74	-1,910.19

註：1. 常數項估計值未列於表中。

2.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 伍、結論

歷經快速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臺灣社會，家庭樣貌展現了極大的變化。然而除了家庭樣貌之外，影響主觀家庭感受的因素，是否也發生了質變？對不同世代女性來說，影響家庭滿意度的因素會一樣

嗎？本文聚焦於「夫妻相對收入」此經濟因素，來探討已婚女性家庭滿意度的決定及其變化。具體提問為，已婚女性是否會因工作收入相對於配偶的收入提高，而影響到其家庭滿意度。本文採用PSFD 2007-2016年的追蹤資料，以年齡介於25-59歲的已婚女性為對象，探討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隨機效果序次probit模型的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結論：一、隨著已婚女性相對收入的提高，家庭滿意度會先隨之提升；當相對收入提升到將近二分之一時，家庭滿意度會隨相對收入的增加而下降。顯示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具倒U形影響效果。二、若依性別角色態度傳統與否來分群，則前述倒U形影響僅存在於非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樣本；在傳統性別角色態度樣本中，已婚女性相對收入未見顯著影響。三、區分世代的分析則發現，對197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來說，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並無顯著影響。以上倒U形關係僅出現在197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身上，顯示已婚女性相對於配偶的收入對其家庭滿意度的影響已隨世代改變。

以上分析結果，為我們帶來豐富的意涵。分述三點如下：

一、著名的女性經濟獨立假說再次被否證：基於傳統經濟學邏輯的經濟獨立假說主張，夫妻分工模式（高薪者負責養家，低薪者負責持家）帶來良好的分工效益，成為婚姻帶來的好處。因此，當女性自己的所得愈高，愈具有經濟自主性，她從婚姻與家庭得到的好處就會愈少。在以上假設之下，可推導出以下各種預測：女性所得愈高，走入婚姻的意願便愈低，一旦進入婚姻且運作不順，愈有離婚傾向。這也隱含著，她從婚姻與家庭得到效益愈低，家庭滿意度可能愈低。然而，本研究所發現的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倒U形相關，若拆成兩段來看，前半段乃為正相關（亦即，已婚女性收入占夫妻加總收入的比例愈高，她的家庭滿意度就愈高）。這樣的結果，事實上再次挑戰了女性經濟獨立假說。何以如此？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結果？這是因為經濟獨立論的假設太窄化現實。它的問題在於其論述只看見夫妻分工帶來

的好處，而未認可其他形式的「效益」，舉例來說，女性就業所可能帶來的自我實現感，或是權力對等對親密關係所可能帶來的生活共享、伴侶交流，都對女性的身心健康具有莫大的重要性。以上這些可能性都可以解釋本文分析所發現的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正相關。

二、丈夫的受損自尊？妻子的分工不滿？兩者均有可能：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詮釋後半段（亦即當已婚女性收入接近總收入的二分之一的時候）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家庭滿意度之間的負相關呢？已婚女性的家庭滿意度，有可能源於自己的不滿，也有可能受到配偶不悅情緒的影響，在此並不易區分這兩種來源，我們僅能嘗試詮釋。當已婚女性為家庭所帶來的經濟貢獻度超過配偶愈多，家庭滿意度愈低，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配偶在男性養家的傳統文化脈絡下感覺自尊受損；另一種可能則是已婚女性在女性總是分擔較多家務的文化慣習中感覺負擔過大、蠟燭兩頭燒，或甚至不公平感遽增。也有可能是由於已婚女性期望配偶應該要有更高的經濟能力，對理想家庭有著夫妻對等、共同分擔的期待。當然也有可能以上各種機制同時運作，彼此並不互斥。

三、讓已婚女性家庭滿意度最高的家計分擔模式隨世代改變：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已婚女性在其收入與配偶收入接近時，家庭滿意度會達到最高。這隱涵了已婚女性如果具有與配偶相近之經濟能力，或說夫妻共同分擔家庭經濟，這樣的家計分擔模式會讓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感受最佳。將樣本進一步依出生世代分群的分析結果顯示，年長世代的已婚女性並未展現上述已婚女性相對收入與家庭滿意度兩者之間的曲線關係；只有在較年輕的世代當中，才呈現出妻已婚女性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倒U形影響，且家庭滿意度在已婚女性與配偶收入相當時達到最高。這顯示，隨著世代更迭，對年輕世代的已婚女性而言，平均分擔家計已然成為家庭滿意度最高的家計分擔模式。

儘管本具有學理、量化研究層面的貢獻，仍有其限制存在。首先，本文分別檢視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是否因性別角色態度、出生世代的不同而有差異，但基於樣本數的考量，並沒有進一步將分析樣本依出生世代、性別角色態度交叉分群（區分為年長世代傳統樣本、年長世代非傳統樣本、年輕世代傳統樣本、年輕世代非傳統樣本），分析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是否存在群體間的差異。對於這項研究限制，隨著PSFD資料隨時間的累積，期待未來可以解答這項問題。其次，本文以家庭滿意度作為應變項，未來可嘗試以婚姻滿意度、夫妻關係等測量作為應變項，觀察本文的分析結果在不同的測量下是否仍然成立。第三，考量對家庭生活不滿意的已婚女性有可能選擇分居、離婚，未來可嘗試放寬樣本條件，分析雙薪家庭中的已婚女性步入分居或離婚的可能性。第四、本文所採用的性別角色態度測量，因受限於二手資料之既定題項，並不算很理想。PSFD未來如能蒐集新的題項資料，可能有助於改善這項問題。最後，文中所採用的已婚女性相對收入，建構自受訪者與其配偶主要工作的月收入資料。未來可考慮放寬收入的界定，並觀察不同來源的收入是否呈現不同的影響效果。

## 謝誌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以及陶宏麟、黃芳玫教授對初稿提供珍貴意見。另外，感謝研究助理洪琮璋先生在資料整理、分析上的協助。

## 參考文獻

- 于若蓉、黃奕嘉 [Yu, Ruoh-Rong and I-Chia Huang] (2018) 家庭動態調查：樣本結構、問卷內容、資料外釋與應用。中國統計學報，56(4): 98-115。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Samples, Questionnaires, Data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6(4): 98-115.
- 行政院主計總處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03) 89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55](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55) (取用日期：2018年4月3日)。“Woman’s Marriage, Fertility and Employment Survey, 2000.” (Date visited: April 3, 2018).
- 行政院主計總處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7) 105年婦女婚育與就業狀況調查。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60](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60) (取用日期：2018年4月3日)。“Woman’s Marriage, Fertility and Employment Survey, 2016.” (Date visited: April 3, 2018).
- 行政院主計總處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7) 106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https://ebook.dgbas.gov.tw/public/Data/0191032464J9NJE4Q.pdf> (取用日期：2018年3月22日)。“Report on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2017.” (Date visited: March 22, 2018).
- 呂玉瑕 [Lu, Yu-Hsia] (2011) 臺灣民眾性別角色態度的變遷：1991-2001。臺灣社會學刊，48: 51-94。“Changes in Gender-Role Attitudes in Taiwan, 1991-2001.”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8: 51-94. doi:10.6786/TJS.201112.0056
- 李明純 [Lee, Ming-Chun] (2019) 性別薪資差異之選擇性偏誤與薪資拆解——臺灣高等教育擴張下之實證。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



- 濟學系碩士論文。“Gender Wage Gap, Selection Bias, and Wage Decomposition: Evidence from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Taiwan.”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10.6342/NTU201803425
- 吳明燁、伊慶春 [Wu, Ming-Yeh and Chin-Chun Yi] (2003) 婚姻其實不只是婚姻：家庭因素對於婚姻滿意度的影響。人口學刊，26: 71-95。“A Marriage Is More Than a Marriage: The Impacts of Familial Factors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6: 71-95.
- 林依伶、楊子霆 [Lin, Yi-Ling and Tzu-Ting Yang] (2018) 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臺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成長脫鉤之成因。經濟論文，46(2): 263-322。“Decoupling of Wage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aiwa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46(2): 263-322.
- 林常青、張俊仁、盧姝璇 [Lin, Chang-Ching, Juin-Jen Chang, and Shu-Shiuan Lu] (2017) 薪資停滯？事實陳述與亞洲跨國比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9(1): 87-125。“Wage Stagnation? Fact Disclosure and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9(1): 87-125.
- 陳婉琪 [Chen, Wan-Chi] (2005) 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臺灣社會學，10: 1-40。“Ethnicity, Gender and Class: Ethnic Difference in Taiwa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visited.” *Taiwan Sociology* 10: 1-40. doi:10.6676/TS.2005.10.1
- 陳婉琪、吳慧靖 [Chen, Wan-Chi and Hui-Jing Wu] (2011) 女性就業與離婚風險。人口學刊，42: 81-114。“Women’s Employment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42: 81-114. doi:10.6191/jps.2011.3
- 黃登興 [Huang, Deng-Shing] (2015) 臺灣薪資停滯現象解析——

- 全球化貿易與投資夥伴。社會科學論叢，9(1): 33-58。“On the Wage Stagnation of Taiwan: Trade and FDI Partners under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9(1): 33-58. doi:10.30401/RSS.201504\_9(1).0002
- 蕭英玲、黃芳銘 [Hsiao, Ying-Ling and Fang-Ming Hwang] (2010) 婚姻滿意度與憂鬱傾向：貫時性對偶分析。中華心理學刊，52(4): 377-396。“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Dyadic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4): 377-396. doi:10.6129/CJP.2010.5204.05
- 謝雨生、周玉慧 [Hsieh, Yeu-Sheng and Yuh-Huey Jou] (2012) 每下愈況或漸入佳境？：夫妻婚姻品質之變化與相互影響性。臺灣社會學，23: 101-154。“Worse or Better?: Trajectories of Marital Quality and Their Mutual Influence among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Taiwan Sociology* 23: 101-154. doi:10.6676/TS.2012.23.101
- 鍾宜吟、蔡明璋 [Jung, Yi-Yin and Ming-Chang Tsai] (2008) 婚前同居、婚姻價值與婚姻滿意度：臺灣民眾的分析。研究臺灣，5: 43-72。“Cohabitation, Marriage Valu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 Study of Taiwan Society.”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5: 43-72. doi:10.6456/JTS.200812.0043
- Becker, G. S. 2009.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arge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trand, M., E. Kamenica, and J. Pan. 2015. “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2): 571-614. doi:10.1093/qje/qjv001
- Blanchflower, D. G. and A. J. Oswald. 2008. “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6(8): 1733-1749. doi:10.1016/j.socscimed.2008.01.030
- Booth, A., D. R. Johnson, L. White, and J. N. Edwards. 1984. “Women,

- Outside Employment,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3): 567-583. doi:10.1086/228117
- Bradbury, T. N., F. D. Fincham, and S. R. H. Beach. 2000.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964-980. doi:10.1111/j.1741-3737.2000.00964.x
- Brennan, R. T., R. C. Barnett, and K. C. Gareis. 2001. “When She Earns More than He Do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ual-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1): 168-182. doi:10.1111/j.1741-3737.2001.00168.x
- Chen, W. c. and Y. C. Hsieh. 2017. “Women’s Greater Independence from Family?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Wives’ Labor Force Exit in Taiwan.” Pp. 129-148 in *Family, Work and Wellbeing in Asia*, edited by M. C. Tsai and W. c. Chen. Singapore: Springer. doi:10.1007/978-981-10-4313-0\_7
- Chen, Y. H. and H. Chen. 2014.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the Timing and Formation of First Marriage among Postwar Birth Cohorts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12): 1584-1604. doi:10.1177/0192513X14538026
- Cherlin, A. J. 2000. “Toward a New Home Socioeconomics of Union Formation.” Pp. 126-144 in *The Ties that Bind: Perspectives on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edited by L. J. Waite, C. Bachrach, M. Hindin, E. Thomson, and A. Thornton. Hawthorn, NY: Aldine de Gruyter.
- Coontz, S. 1997. *The Way We Really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America’s Changing Famili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Coontz, S. 2005. *Marriage, A History: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NY: Viking.

- Costa, P. T., Jr., A. B. Zonderman, R. R. McCrae, J. C. Huntley, B. Z. Locke, and H. E. Barbano. 1987. "Longitudinal Analyse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 National Sample: Stability of Mean Level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1): 50-55. doi:10.1093/geronj/42.1.50
- Dakin, J. and R. Wampler. 2008. "Money Doesn't Buy Happiness, but It Helps: Marital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between Low- and Middle-Income Clinic Coupl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6(4): 300-311. doi:10.1080/01926180701647512
- Deaton, A. 2008. "Income,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 53-72. doi:10.1257/jep.22.2.53
- Furdyna, H. E., M. B. Tucker, and A. D. James. 2008. "Relative Spousal Earnings and Marital Happines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White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2): 332-344. doi:10.1111/j.1741-3737.2008.00485.x
- Glenn, N. D. 1990.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Marital Quality in the 1980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2(4): 818-831. doi:10.2307/353304
- Gong, M. 2007. "Does Status Inconsistency Matter for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12): 1582-1610. doi:10.1177/0192513X07300708
- Greenstein, T. N. 1990. "Marital Disruption and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2(3): 657-676. doi:10.2307/352932
- Greenstein, T. N. 1995. "Gender Ideology, Marital Disruption, and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7(1): 31-42. doi:10.2307/353814
- Hardie, J. H., C. Geist, and A. Lucas. 2014. "His and Hers: Economic

-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4): 728-743. doi:10.1111/jomf.12129
- Heckert, D. A., T. C. Nowak, and K. A. Snyder. 1998. “The Impact of Husbands’ and Wives’ Relative Earnings on Marital Disrup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3): 690-703. doi:10.2307/353538
- Hiedemann, B., O. Suhomlinova, and A. M. O’Rand. 1998. “Economic Independence, Economic Status, and Empty Nest in Midlife Marital Disrup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1): 219-231. doi:10.2307/353453
- Hochschild, A. R. and A. Machung.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NY: Viking.
- Hoffman, S. D. and G. J. Duncan. 1995. “The Effect of Incomes, Wages, and AFDC Benefits on Marital Disruption.”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0(1): 19-41. doi:10.2307/146189
- Hood, J. C. 1983. *Becoming a Two-Job Family*. New York, NY: Praeger.
- Jackson, G. L., J. L. Krull, T. N. Bradbury, and B. R. Karney. 2017. “Household Income and Trajectorie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Early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3): 690-704. doi:10.1111/jomf.12394
- Jalovaara, M. 2003. “The Joint Effects of Marriage Partners’ Socioeconomic Positions on the Risk of Divorce.” *Demography* 40(1): 67-81. doi:10.1353/dem.2003.0004
- Johnson, D. R. 1995. “Assessing Marital Quality in Longitudinal and Life Course Studies.” Pp. 155-202 in *Family Assessment*, edited by J. C. Conoley and E. B. Werth. Lincoln, NE: Buros Institute of Mental Measurements.
- Johnson, D. R., L. K. White, J. N. Edwards, and A. Booth. 1986. “Dimensions of Marital Quality: Toward Methodological and

- Conceptual Refine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7(1): 31-49.  
doi:10.1177/019251386007001003
- Johnson, W. R. and J. Skinner. 1986. “Labor Supply and Marital Sepa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3): 455-469.
- Kalmijn, M., A. Loeve, and D. Manting. 2007. “Income Dynamics in Coupl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44(1): 159-179. doi:10.1353/dem.2007.0005
- Lee, K. S. and H. Ono. 2008. “Specialization and Happiness in Marriage: A U.S.—Japan Comparis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4): 1216-1234. doi:10.1016/j.ssresearch.2008.02.005
- Lye, D. N. and T. J. Biblarz. 1993. “The Effects of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Life and Gender Roles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4(2): 157-188. doi:10.1177/019251393014002002
- Olson, D. H., H. I. McCubbin, H. L. Barnes, A. S. Larsen, M. J. Muxen, and M. A. Wilson. 1989. *Families: What Makes Them 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 Ono, H. 1998. “Husbands’ and Wives’ Resources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0(3): 674-689. doi:10.2307/353537
- Oppenheimer, V. K. 1988.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3): 563-591. doi:10.1086/229030
- Oppenheimer, V. K. 1997.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Gain to Marriage: Th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 Mode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431-453. doi:10.1146/annurev.soc.23.1.431
- Raymo, J. M., H. Park, Y. Xie, and W. j. J. Yeung.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doi:10.1146/annurev-soc-073014-112428
- Raymo, J. M. and M. Iwasawa. 2005. “Marriage Market Mismatches in Japan: 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5): 801-822. doi:10.1177/000312240507000504
- Robles, T. F., R. B. Slatcher, J. M. Trombello, and M. M. McGinn. 2014. “Marital Quality and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1): 140-187. doi:10.1037/a0031859
- Rogers, S. J. 1999. “Wives’ Income and Marital Quality: Are There Reciprocal Effec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1): 123-132. doi:10.2307/353888
- Rogers, S. J. 2004. “Dollars, Dependency, and Divorce: Four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Wives’ Incom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1): 59-74. doi:10.1111/j.1741-3737.2004.00005.x
- Rogers, S. J. and D. D. DeBoer. 2001. “Changes in Wives’ Income: Effects on Marital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he Risk of Divor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2): 458-472. doi:10.1111/j.1741-3737.2001.00458.x
- Ruggles, S. 1997. “The Rise of Divorce and Sepa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90.” *Demography* 34(4): 455-466. doi:10.2307/3038300
- Sayer, L. C. and S. M. Bianchi. 2000. “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Divorce: A Review and Reexamin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7): 906-943. doi:10.1177/019251300021007005
- Scanzoni, J. 1972. *Sexual Bargaining: Power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Marriag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anzoni, J. 1978. *Sex Roles, Women’s Work, and Marital Conflict: A Study of Family Chang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Smits, J. and H. Park. 2009. “Five Decade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in 10 East Asian Societies.” *Social Forces* 88(1): 227-255. doi:10.1353/sof.0.0241
- South, S. J. and K. M. Lloyd. 1995. “Spousal Alternatives and Marital



- Diss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1): 21-35. doi:10.2307/2096343
- Spanier, G. B. and R. A. Lewis. 1980. “Marital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Seven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2(4): 825-839. doi:10.2307/351827
- Spitze, G. and S. J. South. 1985. “Women’s Employment, Time Expenditure, and Divor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6(3): 307-329. doi:10.1177/019251385006003004
- Stanley, S. M., P. R. Amato, C. A. Johnson, and H. J. Markman. 2006. “Premarital Education, Marital Quality, and Marital Stability: Findings from a Large, Random Household Surve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 117-126. doi:10.1037/0893-3200.20.1.117
- Sweeney, M. M. 2002. “Two Decades of Family Change: The Shifting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1): 132-147. doi:10.2307/3088937
- Treas, J. 1993. “Money in the Bank: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5): 723-734. doi:10.2307/2096283
- Tsai, S. L., H. Gates, and H. Y. Chiu. 1994. “Schooling Taiwan’s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4): 243-263. doi:10.2307/2112815
- Ulloa, B. F. L., V. Møller, and A. Sousa-Poza. 2013. “How Does Subjective Well-Being Evolve with Age?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6(3): 227-246. doi:10.1007/s12062-013-9085-0
- Waismel-Manor, R., A. Levanon, and P. S. Tolbert. 2016. “The Impact of Family Economic Structure on Dual-Earners’ Career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Sex Roles* 75(7-8): 349-362. doi:10.1007/s11199-016-0620-3

- White, L. and S. J. Rogers. 2000.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Family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199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1035-1051. doi:10.1111/j.1741-3737.2000.01035.x
- Xu, X. and S. C. Lai. 2004. "Gender Ideologies, Marital Roles, and Marital Qual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3): 318-355. doi:10.1177/0192513X03257709
- Zhang, H. and S. K. M. Tsang. 2012. "Wives'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Role of Perceived Equ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5(4): 406-420. doi:10.1007/s11211-012-0166-7
- Zhang, H. and S. K. M. Tsang. 2013.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Happiness among Urban Chinese Wome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son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5): 1575-1584. doi:10.1007/s10902-012-9396-5
- Zhang, H., S. K. M. Tsang, P. Chi, Y. T. Cheung, X. Zhang, and P. S. F. Yip. 2012. "Wives' Relative Income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the Urban Chinese Population: Exploring Some Moderating Effec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3(2): 185-199. doi:10.3138/jcfs.43.2.185

## 附錄一：變項的平均值或百分比 (依性別角色態度分群)

變項	傳統樣本	非傳統樣本
不隨時間變動的變項		
出生世代 (%)		
年長世代	57.50	32.21
年輕世代	42.50	67.79
教育程度 (%)		
國中或以下	38.14	11.35
高中或高職	33.48	19.02
專科	13.97	16.87
大學或以上	14.41	52.76
隨時間變動的變項		
妻子相對收入	0.36 ± 0.30 <sup>a</sup>	0.39 ± 0.25
年齡	44.89 ± 9.79	40.20 ± 8.82
家庭滿意度	3.16 ± 0.59	3.18 ± 0.58
自己健康狀況 (%)	90.22	93.27
配偶健康狀況 (%)	90.41	95.08
子女年齡結構 (%)		
5歲或以下子女	18.54	34.60
6-18歲子女	39.04	40.50
19歲或以上子女	52.23	28.43
與自己父母同住 (%)	7.61	10.19
與配偶父母同住 (%)	28.54	28.09
家庭收入	58.01 ± 54.53	90.35 ± 73.83
受訪者人數	687	326
觀察值筆數	3,140	1,442

註：對不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基本統計值是以「受訪者」為單位計算；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則以「觀察值」為單位計算。

<sup>a</sup>數值以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 附錄二：變項的平均值或百分比 (依出生世代分群)

變項	年長世代樣本	年輕世代樣本
不隨時間變動的變項		
性別角色態度	3.58 ± 0.93 <sup>a</sup>	3.14 ± 0.91
教育程度 (%)		
國中或以下	50.26	6.14
高中或高職	30.12	30.39
專科	10.33	20.47
大學或以上	9.29	42.99
隨時間變動的變項		
妻子相對收入	0.40 ± 0.33	0.33 ± 0.22
年齡	50.87 ± 5.83	34.09 ± 3.26
家庭滿意度	3.15 ± 0.57	3.17 ± 0.58
自己健康狀況 (%)	88.67	95.31
配偶健康狀況 (%)	88.99	96.06
子女年齡結構 (%)		
5歲或以下子女	1.67	51.43
6-18歲子女	34.57	47.65
19歲或以上子女	78.49	1.95
與自己父母同住 (%)	6.32	11.89
與配偶父母同住 (%)	18.03	40.37
家庭收入	57.85 ± 63.14	82.67 ± 60.45
受訪者人數	581	635
觀察值筆數	2,878	2,514

註：對不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基本統計值是以「受訪者」為單位計算；隨時間變動的變項，則以「觀察值」為單位計算。

<sup>a</sup>數值以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

# Married Women's Relative Income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Ruoh-Rong Yu\* Wan-Chi Chen\*\*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arried women's relative income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for married women in Taiwan. Using panel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Taiwan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surve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married women's relative income on family satisfaction among women aged 25 to 59.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married women's relative income exhibit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her family satisfaction. When the married women's income is near her husband's, the married women's family satisfaction reaches the highest level.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ly exists in the younger cohort or subgroup with non-traditional gender-role attitud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but also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married women's relative income on her family satisfaction.

***Keywords: married women's relative income, gender-role attitudes, family satisfaction,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

\*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urr@gate.sinica.edu.tw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wchen@gm.ntpu.edu.tw